



2000年在 亚洲的态势与走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叶自成 王文英

(一) 亚洲政治

1999年亚洲政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政府与议会换届选举，使亚洲本年成为大选年。

1999年亚洲的几个重要的国家，日本、印尼、印度、马来西亚以及以色列都相继出现了政治局势的较大的变化，在巴基斯坦还出现了军事政变。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议会的更换和选举，成为1999年亚洲国内政治的焦点。6月7日印度尼西亚举行了前总统苏哈托下台后的首次国会选举，这是30多年来印尼第一次多党大选。10月20日，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主席瓦希德当选为印尼第四任总统，从而结束了印尼长期动荡的政治危机。10月7日，印度第十三届人民院选举，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成立，瓦杰帕伊继续出任总理。以色列则在7月由反对党领袖巴拉克以65%的选票优势当选为以新一届总理。日本内阁改组也成为亚洲大选年中的一个焦点。10月5日，小渊惠三改组内阁，由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联合执政的日本新内阁组成。11月，马来西亚进行了提前议会大选，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国内政治、经济形

势使提前大选对执政者更为有利。而10月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变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更，以穆沙拉夫为首的军方认为前总理谢里夫“出卖国家利益并企图把外部势力引入巴国内事务”，从而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政权。这些变更的意义不仅在于国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更为重要的是，新一届政府将采取何种对外政策，发展怎样的对外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都是世人所关注的。因为它涉及到亚洲形势的稳定和格局的变化。

(2) 新一届政府在国内政策中，均将振兴、发展本国经济放于首位。众所周知，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将亚洲经济带入低谷，在经过1998年的思考与调整之后，重振本国经济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不仅印度尼西亚、印度、以色列的新政府上台伊始，都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振兴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就是巴基斯坦由军人控制的非民选政府也宣称，巴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振兴濒于破产的经济，打击腐败。从而使其在巴国内赢得了好感。而马来西亚提前大选的原因更是与国内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因为马来西亚1999年的经济形势有所复苏，这对取得民众对现政府的支持有利。

(3) 在对外政策中，各国均试图寻求建立一种和平、友好、稳定的对外关系。

新政府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其目的在于，一是为了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通过友好的对外关系解决本地区的热点问题。如印尼为了打开过去两年来几乎无外交的局面，瓦希德多次阐述了他的外交政策设想。他宣布将第一个访问中国，然后是日本和印度。他说，印尼、中国、印度、日本、新加坡合起来的资金技术，可以使亚洲成为与美国和欧洲相抗衡的强大经济力量。而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府在建立之初就向印度伸出了橄榄枝，单方面宣布从印巴国际边境线撤军以缓和两国紧张局势，这被认为是争取美印两国信任的举措。

(二) 亚洲经济

始于1997年7月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打击极为严重，并波及全球，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动荡。然而两年来亚洲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在各国内部的调整改革和国际协调与合作下，正在出现缓慢复苏的征兆。其主要表现是：(1)经济恢复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数字表明，1999年，除印尼负增长0.8%外，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将普遍实现增长，从1.2%到6.5%。(2)股市和汇市回升。东亚地区大部分股市已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而国家货币汇率大部分恢复到危机前70%到80%的水平。(3)出口增加，经常项目盈余扩大，外汇储备增加。(4)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工业生产回升。截至去年6月底，东亚5国的利率平均下降了7.3个百分点。随着内需回升和生产增长，投资也有所增加。韩国1999年第二季度工业生产上升29.5%。(5)需求增加。就零售额而言，去年6月份韩国和新加坡分别增长10%和22%。(6)国际社会对东亚地区的信心开始恢复，国际投资者的目光再次转向东亚。(7)东亚与北美的经济将会逐步增加，去年9月13日，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七次非正式领导人会晤，对亚洲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次非正式会晤通过了《奥克兰挑战》宣言，强调亚太经合组织要努力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强劲和开放的市场以支持经济增长，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多边贸易体制发挥领导作用，以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

了APEC的五条经验，提出今后的两个任务和六项工作。

作为亚洲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也是亚洲经济总体看好，新的一年经济有望继续回升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对亚洲经济的积极影响是，第一，作为亚洲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继续保持对外资的较大吸引力，虽然1999年中国吸收的外资较去年有所下降，但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双边协议，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亚洲经济，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总的来看会对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起促进作用；第二，中国作为亚洲经济增长最快，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在1999年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据估计，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将将达到7%。9月27日—29日，在中国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第五届《财富》全球论坛，探讨主题为“中国—未来50年”。与会者认为中国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和市场需求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和强劲的拉动力，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将进一步为经济增长创造活力和公平竞争环境，40%左右的高储蓄率可以将投资率保持在33%。这至少说明一点，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大大增加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当然，亚洲经济的复苏还没有完成，今年将会处于调整阶段，依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改革调整滞后，有可能拖延全面复苏。从总体上来看，东亚地区主要是靠扩大支出来推动复苏的，而不是通过健全的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深入的结构调整和生产率的提高。况且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既有阻力，也需要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增加决策透明度，铲除腐败和欺诈行为。这些都是实现健康、全面复苏的先决条件。其次，目前东亚经济复苏过程中存在的出口、内需、投资仍嫌不足；呆帐严重、信贷萎缩；债务负担沉重，政府财政赤字加大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亚洲经济的复苏。第三，日本经济的走势也将较为严重地影响到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进程。因为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它目前仍受着设备过剩、人员过剩和巨额不良债权三大难题的困扰。前一段时期日元的急剧升值已直接影响其他东亚国家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第四，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还将受到政治的较大的影响，政治局势能否保持稳定也存

在一定的问题。总之，东亚经济的全面复苏还需一段磨合时期，即使今年亚洲经济继续回升其幅度也不会很大。

两年来，东亚各国面对深重的金融危机，趋利避害，加大改革调整力度，努力走出危机的泥潭。

总体来说，1999年的亚洲金融形势出现好转，股市止跌反弹，汇市逐渐回升，各国国际收支得到改善，从而增加了外汇储备，外资开始回流，据世界银行统计，到1999年5月份，流向东亚国家的国际资金总额达60亿美元。据金融专家分析，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外资加快流入亚洲资金市场的趋势不会减弱。其原因在于，一、国际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思危心理；二、亚洲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变化推动了资金市场趋旺。专家们认为，中国如加入WTO，经济改革步伐会继续加快，市场将不断开放，会更多地吸引外来投资。日本调整金融和刺激经济措施开始见效，对亚洲经济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当然即使如此，亚洲的金融领域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了。一方面，外资的回流和出口的增加依旧不能满足亚洲经济恢复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部分东亚国家银行呆帐问题依然严重，银行难以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贷款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的金融体系，不能为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提供良好的基础。金融体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在各国对金融危机的深刻思考和认识的基础上，在各国对改革和健全国际金融体制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希望新的世纪能带来新的气象。

(三)亚洲科技

21世纪是科技竞争的世纪，谁能抢先占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和欧美相比，亚洲的科技在总体上仍大大落后。面对这种形势，亚洲各国加强了对科技的投入，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科技创新战略。日本明确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战略。这表明，在继续发扬技术创新的同时还增添了科学创新。为了使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能有效地持续下去，又强调观念创新、管理创新、科技体制创新，并制订了《科学基本法》等，以从法律和政策上提供保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特别强调技术预测、项目选

择、开发、成果转化、运输、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上的高效、快捷。韩国从“引进、模仿”战略演变为“创造性、自主性”创新战略。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颁布了《科技创新特别法》，增强政府在国家技术创新系统中的重要作用。“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九五”计划中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目标是国民经济发展中追求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并制订了相应的科技攻关计划。在1999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又把“加快科技进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200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今后中国一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二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努力占领科技制高点。同时还提出了继续增加科技投入，建立和完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机制，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四)亚洲军事安全局势

冷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近十年左右，在这十年中，虽然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贯穿始终，但是不同的阶段依然有不同的侧重点。前期由于两极格局的解体，世界处于向新格局过渡的阶段，为了在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各国纷纷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上来，经济的合作与竞争成为主流；近两、三年，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存在使得各国逐渐认识到，单一发展经济而不重视军事力量的发展是不行的，于是，军事战略的制订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各国纷纷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制订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以高科技武装本国军队，加强国防力量，确保国家安全。

中国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力量，中国为亚洲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一度破坏了东亚的安全形势，使得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紧张。为了对付台湾岛内的分离主义势力，中国不得不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次对台湾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严重警告。同时，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主权不受侵犯，中国也加快了国防现代化的步伐。

针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范围的扩大和周边国家形

势的变化对中国安全带来的复杂的局势，中国正在为新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制订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加强陆、海、空三军的作战能力与联勤能力，并发展信息系统。中国陆军配合裁军形势，加强部队机动能力。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亚洲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亚洲得以保持大体平稳的积极因素。

日本在以各种名义加强本国军事力量的同时，也不断地强化美日军事合作。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不顾广大国民反对，相继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其出笼与通过标志着日美之间的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两国军事合作的范围由过去日本及远东地区扩大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8月21日日本防卫厅又决定在新年度(2000年4月—2001年3月)预算中单列出21亿日元专门用于日美两国共同开展有关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8月25日，日本开始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律中的主要法律“周边事态法”。日本防卫厅按新制订的下半年度充实防卫力量计划，要求政府增加防卫预算。日本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执意进一步强化日美军事合作的举动，以及其不止一次暗示“周边”范围包括中国的台湾海峡的言论，引起中国的严重关切。

菲律宾与美国在1998年2月签署的一项名为“访问部队协定”，1999年5月27日经菲律宾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正式生效。这不仅意味着今后菲律宾和美国将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同时还为美国重返菲律宾，并在亚太地区充当“世界警察”提供了便利条件。《访问部队协定》是菲美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和相互利用的产物。菲律宾的主要目的在于：(1)经济利益。菲律宾企图通过同美签此协议来回报美赐予的优惠和“特权”。(2)安全利益。希望美军重返菲律宾，为菲提供更多的安全保护。(3)寻求美国帮助其实现军事现代化。

印度近年来为谋求世界“一流大国”的地位和争当地区军事强国，加紧了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军队建设的步伐。首先，积极发展以核武器为主要内容的战略威慑力量。据国外有关机构估计，印度现在已拥有20—60枚核武器，并拥有生产70余枚核弹所需的核材料钚，到2005年，印度将能够生产100余枚核弹，核弹总数可达120—160枚。同时印还大力研究和开

发弹道导弹技术，其目标是在下个世纪初初步建成由陆基弹道导弹、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威慑力量。1999年8月17日，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公布了印度的核武器政策草案，称印度将奉行有效及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战略，只有在遭受第一次打击之后才会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这是印度正式宣布的第一项核武器政策声明。此外，印度还进一步调整其军事战略内容，加强军队作战能力。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冷战结束已经快十年，而冷战局面在朝鲜半岛仍然存在。朝鲜和韩国在军事分界线的两侧继续保持着高密度的军事对峙局面，成为世界上军事力量部署最为密集的地区。朝鲜在研制自己的导弹系统，而韩国也在开发自己的飞马座导弹。

1999年的亚洲，不仅旧的热点地区形势仍然不明朗，如朝鲜半岛、中东和平进程，而且又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如东帝汶冲突和印巴紧张局势。

在这些紧张局势时缓时急的同时，东盟则由于4月30日柬埔寨的加入而实现了“十国大东盟”的梦想。大东盟的形成一方面会给东盟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首先，将大大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稳定，给地区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其次，有利于东南亚国家间经贸交流，促使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第三，从一定程度上讲，大东盟的形成也增强该组织在国际机构和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挑战存在，经济危机的影响、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外部关系的处理都影响到大东盟作用的发挥。不过，总体来说，大东盟已经成为亚太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将会对地区和平与发展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外交在1999年成为亚洲局势的一个亮点。2月5日，中国与泰国在曼谷正式签署中泰《关于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2月25日，中国与越南在北京发表了“建立面向未来的全面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8月24日—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吉尔吉斯坦会晤，主要讨论了地区安全、区域经济合作及国际形势等问题，并发表了联合声明《比什凯克声明》，阐述了五国对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共识。此外，中国国家领导人还对蒙古、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进行了国事访问，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

(责任编辑：王梅)